

REMODELING CHINESE UNIVERSITY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PHILOSOPHY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University Charter of Hong Kong



重塑华人大学 组织文化与理念

基于香港地区大学章程的调查研究

尹建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MODELING CHINESE UNIVERSITY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PHILOSOPHY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University Charter of Hong Kong

重塑华人大学 组织文化与理念

基于香港地区大学章程的调查研究

尹建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塑华人大学组织文化与理念：基于香港地区大学章程的调查研究 / 尹建锋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61-8459-2

I. ①重… II. ①尹… III. ①高等学校—章程—研究—香港
IV. ①G649.28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615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自读了博士研究生以来，笔者开始感觉到做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谨性，故研究工作的每个步骤都怠慢不得，力求完善。这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算是自己的第一本出版的学术著作，在感到荣幸的同时，也颇为忐忑，不知在学术上是否把事理说得够清楚，值得大家一看。无论如何，在此期望拙作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也算心安了。

在今日倡导“法治”的国家语境里，及时在大学治理领域引入法治思维，正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就这个社会需求而言，出版这本关于大学章程及组织文化与理念的书籍，以飨读者，也算是尽个人的绵薄之力。

当然，关于大学章程的研究和谈论已经成为比较热门的话题，相信其能起到增强国人的法治观念的功效。然而，对以研究高深学问、培育德才兼备的高等人才的大学而言，必有其相较于其他社会机构特殊的地方，其法治的观念和模式，必然表现出比较特殊的地方，本书努力在广阔的高等教育知识视野里，发现大学章程如何通过塑造大学组织文化来实现其特殊的法治功能。

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法治的观念和思维的表现形式总是以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根基的。要了解中国大学章程的法治特征，如何在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确实需要寻找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本书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选取香港地区的大学章程作为研究的对象，期望从实践经验出发，获得较为

中肯的理论认识和政策建议，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期望读者在本书中能获得的启示，在此略作介绍，以节约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其大概有这么几点。

一是华人文化与英国等西方文化如何在融合的基础上，成为香港地区大学章程所植根的文化土壤。香港社会的法治模式实际上是模仿了英国社会的，包括大学制度在内，作为外来社会变量，强制性地引入香港华人社会。这其中所引起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及大学制度与文化的演化，值得深究和探索。

二是香港地区大学章程的法治逻辑是怎样的，如何影响大学的发展趋势，分析其中的优点和缺点。香港地区的大学获得了卓越的成就，其成功必然有内在的逻辑和理由，根据大学章程、办学模式等基本的资料分析，获得对香港地区大学章程法治的基本认识。

三是香港社会的法治模式和香港地区大学章程的强制性引入，如何在华人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独特的香港地区大学组织文化。法治是一种硬性的治理模式，只能为软性的治理模式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却不能代替诸如组织文化等软性力量发挥功能。因此，大学章程在香港地区大学的实施，如何催生出良好的大学组织文化，从而形成大学发展的精神力量，值得推敲。

四是借鉴香港地区大学办学的经验，辩证地分析包括大学章程在内的香港地区大学制度体系，我们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关于大学制度改革的认识。借鉴成功的办学经验，成为当前大学制度改革领域的重要一环，通过对香港地区大学章程及办学经验的研究，我们如何制定符合我们民族文化和国情的大学章程，塑造具有华人文化特色的大学组织文化与理念，成为本书最后的研究结论。

本书的出版，在此要感谢崔延强先生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其他好友的关切之情。虽然自己对书稿的修改给予了较高的重视，

也付出较多的心血，但限于水平也难免有纰漏之处，其他学术方面的缺憾也在所难免，在此期望各位读者、同人不吝指正。

尹建锋

重庆市渝中区 2015 年 3 月 30 日

目 录

导 论	(1)
一 问题的缘起	(1)
二 研究的对象与概念的界定	(4)
三 研究现状及结论	(8)
四 研究方法	(19)
五 研究思路	(21)
第一章 影响香港地区大学章程的外部因素	(23)
第一节 英国大学传统	(23)
一 英国中世纪大学的特许状及章程	(23)
二 近现代以来的英国大学制度演变：以牛津 大学章程为例	(52)
三 英国传统对香港地区大学的早期影响： 香港大学的成立	(59)
第二节 香港政府的政治体制	(61)
一 香港政治体制的特点及其对大学的影响	(62)
二 香港政府对大学间接治理的中介机构	(76)
第二章 香港地区大学章程的制度逻辑	(98)
第一节 大学条例对大学权力的限定	(98)
一 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限定	(102)
二 大学的分权制衡与咨询协调机制	(103)
三 大学管理规则	(112)

第二节 大学条例的治理逻辑	(123)
一 大学决策的“民主自治”原则	(124)
二 执行大学决策的“校长负责制”与 “权力的转授”	(131)
三 学术治理的“教授治校”精神	(136)
第三节 三所大学的大学条例差异与制度差异	(141)
一 香港大学：英式大学	(141)
二 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制基础上的英式大学	(142)
三 香港科技大学：美式大学	(145)
第四节 大学条例执行中的组织管理绩效	(146)
一 行政管理：“民主制”下的“官僚制”	(148)
二 学术管理：学术市场是否可能？	(157)
三 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之谜及一个理论假设	(163)
第三章 大学章程对大学组织文化的影响：组织认同 及其制度执行力	(169)
第一节 大学组织成员对大学章程的“认知— 认同”机制	(169)
一 “认知—认同”与大学章程文本	(169)
二 压力、趋利与信念	(175)
第二节 大学组织文化的形成	(180)
一 法治文化中的“卡里斯玛”型领袖观念	(180)
二 大学组织文化中的“共享假设”	(184)
三 大学组织文化的生成要素：传统、 规则与信念	(188)
第三节 大学组织成员的观念结构、价值取向与 制度执行力	(191)
一 观念结构理论	(191)
二 观念结构的价值取向与制度执行力	(195)

第四章 香港地区大学的章程及组织文化的启示	(227)
第一节 香港地区大学的章程及组织文化是塑造华 人大学理念的典范	(227)
一 香港地区大学章程执行中的组织文化特质： 中西合璧	(227)
二 大学制度的三元建构：章程、组织 文化与理念	(241)
三 “华人大学理念”的提出	(248)
第二节 基于香港经验对构建中国现代大学 制度的设想	(252)
一 香港经验：大学章程是构建现代大学 制度的基石	(252)
二 香港经验的可取之处及其困难	(256)
三 中国内地大学章程的“立法”之路	(265)
结 语	(270)
参考文献	(273)
附 录	(283)
后 记	(311)

导 论

逻辑开始于推理，而推理主要是意义之间的蕴涵。

——R. 加西亚

大学之发展方向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文明之性格。

——金耀基

一 问题的缘起

本书以中国内地旁观者的身份研究香港地区的大学制度。

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对象，与当前中国内地大学制度研究的局限性与封闭性有关。目前中国内地大学制度的研究要么就事论事，在大学制度的某个局部问题上纠缠不休，要么将欧美大学经验直接拿来说事或应用，忽视了欧美理论在本土化上的文化障碍。对上述研究的形式和进路的质疑有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大学制度不应当仅仅是设计蓝图，而应当是大学经验的历史积淀。现代大学是西方中世纪大学的历史产物，与西方宗教文明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①从这种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大学制度是一种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韦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页。

设计，但是，从历史经验上来看，现代大学不仅仅是现在时的存在，而是有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积淀。尤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说，现代大学是西方知识传承机制与社会信仰体系历史演化的结果：现代大学制度的框架构造，一方面是西方古老文明的性格决定其原初形态，另一方面是长期的社会历史变迁对制度文化的润化与固化。反过来说，“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① 因此大学制度的历史变迁成为理解近现代大学形成的关键，大学及其制度是一种“历史存在”，当然也是某一民族历史的存在。因此，研究内地大学，寻求突破大学困境的解决之道，不仅仅要从制度框架中获得规范上的认识，更要从本土的民族历史经验中获得大学制度框架的原初形态及其文化内涵上的认识。

第二，大学制度不是仅靠理性逻辑所能说清楚的，本土文化必须嵌入大学逻辑的意义中去。中国自清末以来开始建立西方模式的大学，从制度上来说，一直效法西方，不论是欧美的还是苏联的。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的、政治体制的原因，至今仍没有建立起真正生长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西方”大学制度。自我国开启大学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序幕后，我们仍然使用欧美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框架来解释本土大学的现状及其内在机制。我们可以轻易地将西方大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制度、教学技术、硬件设备、规章制度的条文及宏观政策等引入我国内地大学的建设中，但是很难引入西方的社会文化环境，而社会文化环境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是大学内部运行的外部变量。如果没有类似西方的社会文化环境，引进的西方大学制度逻辑，要么失去原有的意义，要么在执行过程中变形，异化出其他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韦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不理想的意义。西方的大学制度理论对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固然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在“拿来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拿来”大学真正的精神与理念，我们的大学并没有发育成国家文明的策源地。因此，在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大学制度及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大前提下，西方大学制度理论是不能够完整地解释中国的大学经验的，我们需要一套能够解释本土大学经验的大学制度理论框架。

基于以上认识，有必要将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与经验引入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本土化境遇中。由此，笔者提出关于华人大学组织的大学制度理论框架，以解释华人大学组织运行中的制度逻辑及本土文化处境。

出于这样的理论研究目的，笔者从本土经验入手。首先来看中国内地比较成功的办学实例，比如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当代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办学实力居于世界中上游水平的高校。它们都可以成为研究华人大学的合适对象，但是缺乏达到上述研究目的的适切性。

第一，民国时期的大学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中有其特殊之处，他们背负着民族救亡的使命，表现出了卓越的大学精神与民族精神，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及经贸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着天壤之别。一是当时的大学制度构造过程与机制显然不能用承载当代大学使命的政治理论、大学治理理论来解释；二是当代的大学处于全球化竞争的环境中，尤其在高科技、工商领域，大学的商业化趋势明显。

第二，当代的中国内地大学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照搬了苏联模式，大学制度框架构造从此开始脱离原有从西方移植的大学制度模式，形成了“政治挂帅”、专才培养、集权统一的大学制度框架，已经无法用西方大学制度理论来解释大学的本质与理念。近几年启动的旨在脱离苏联模式的大学体制转型，由于原

有的制度惯性、文化环境束缚等困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集中统一的“计划”办学模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处在这种模式的羁绊之中，2003年的北京大学体制改革失败就是明证。

另外，香港地区的大学通过短短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香港地区已经成为亚洲地区的高等教育枢纽，在世界高等教育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香港地区在英国殖民者一个半世纪统治之下，深受西方制度文明的影响，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大都市。香港地区从历史发展阶段上来说，与内地相比已先行一步实现了西方现代制度文明的本土化过程。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香港地区的大学与内地大学相比，是一枝独秀，有着制度与实践上的优势。虽然香港与内地在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但两地在社会文化渊源上是同根同源，同属于华人文化圈，很多方面的文化认同感是相同的。因此，香港地区的大学制度与文化在大学组织中的逻辑，对努力建设现代大学的内地而言，应当具有较高的、较特殊的参考价值。

二 研究的对象与概念的界定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以香港地区的中国人为主要构成的大学组织。通过把英国古老大学制度移植到香港地区的历史分析，以及香港与内地大学组织的观念结构比较分析，笔者发现香港地区华人大学组织“中西合璧”的制度特质，具体包括大学的章程、组织文化与理念三方面，构造出三元结构的大学制度理论，并提出“华人大学理念”概念。

已有学者对于“华人大学理念”有明确的认识或认定，主要以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的立场来理解这一理念。在此，笔者对本书所用的“华人大学理念”进行澄清，并界定该概念的内涵。

第一,“华人大学理念”不仅指大学的理念,更侧重于大学中的“华人”理念。本书认为大学是人的组织集合体,华人大学实质上是华人的大学组织实体,该大学的理念某种意义上是华人文化意识中的理念,即华人是文化意义上的称谓。

金耀基教授在《大学之理念》中不但用西方话语方式论及了从英国、德国到美国的大学理念,还站在民族国家的角度,用本民族文化自觉的话语方式论及中国大学的理念:“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负现代大学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与想象力的重大挑战。”^①甘阳受此启发提出“华人大学理念”的概念,在《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一文中有所言:

如果综合这四位香港高等教育者的看法,则我认为“华人大学的理念”之核心问题实际已经非常清楚,这就是,华人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

甘阳根据香港高等教育界的主流认识提出这一理念,是对内地大学文化自信缺失的关切。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成为华人大学理念的精髓。香港地区的高等教育界在1997年后,开始

^①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5页。

反思香港高等教育往何处去的问题,^①这实际上是香港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反观与沉思,而不仅仅是大学发展方向的问题。然而,甘阳认为北大改革方案是背离华人大学理念的:“我们现在担心的问题恰恰是,最近北京大学等的改革方向,是否会导致失去中国大学在思想学术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独立自主,是否会反而主动自觉地把北京大学等变成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②无论北大改革方案作为西式药方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甘阳认为这是北大的西化,其就此成为西方大学“附庸”,他的这种观点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而香港地区对本地高等教育完全西化的担忧,是出于文化身份自我标识的意识,但实质上绝不排斥西方先进的、可借鉴的制度与技术。很明显,以甘阳为代表的内地学者认为,华人大学要“独立门户”,在思想文化上、学术上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对西方大学制度等“先进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而香港地区的学者主要是在经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西化之后,开始反思自身的文化身份。两地由于历史处境的不同,对同样的民族主义意识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然而,甘阳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差别。

两地高等教育者的上述对“华人大学理念”的认识是有差别的,核心之处是如何看待西方先进的大学制度,西方大学制度除了逻辑层面,本身是一种文化的形式,这种文化形式在很多方面具有普适价值,如大学章程文本所表达的理性、公平、正义、合理、信念等。“华人”作为文化概念面对西方先进制度,应当在多元化立场上实现世界开放性与自身独立性的融合,否则,“华人”概念会走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死胡同,走向“文化自负”,而不是“文化自信”。

① 尤其是香港高等教育界在教学语言、学术论文语言方面的中英文之争。

② 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第7期。

第二,“华人大学理念”以华人大学组织文化作为观念意识的基础。“华人”是众多个体组成的组织集合体,有一定的组织文化特征,因此“华人大学理念”是以华人组织文化为思想基础的理念,这影响到大学的教育方式、学术研究方式以及各种评价方式。甘阳对北大改革方案及对北大等中国内地高校的关切,主要集中在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等领域的形式、途径不断西化方面,对以西方为标准的现状表示不满。但是,他所不满的依据仅仅建立在民族主义自我意识基础上,却没有提及中国大学所存在的制度文化方面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在大学规章、组织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缺憾,而这种缺憾正是导致大学不断盲目西化而失去“文化自信”的原因,同时又恰恰是西方大学制度所具备的优势。西方大学在组织文化上的优势,就大学的现代意义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东方社会。华人大学组织文化,从理论上应当既有西方与东方所共有的普适价值,又有建立在民族文明多元化基础上的独特性。就内地大学而言,种种证据表明其缺乏学术求真、公平公正、理性合理的学校组织文化氛围;而在香港地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学校组织文化氛围,这值得称道,但同时需要不断反思大学组织文化中民族意识匮乏的问题。因此,说到底,“华人大学理念”应当是华人大学组织文化所指向的世界性大学的理念。

综合以上两点认识,香港地区大学制度的内涵,实际上是西方大学制度(以大学章程为主要载体)在香港华人组织文化中体现出的普适价值;在此开放性基础上,挖掘华人大学组织文化中独具民族特性的大学理念。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香港地区大学主要是指研究型的公立大学。在本研究中,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们在香港地区最早的三所公办大学,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三 研究现状及结论

（一）大学制度研究的概况

大学制度的研究往往与大学自主权或自治权、学术权力的研究相互糅合在一起。现代大学制度从本质上讲，以大学的自主或自治为基本点，以便实现学术的自由和自治。因此，在梳理相关文献的时候，只能围绕着这几点综合起来进行评述，无法断然分开，各讲其理。

没有一流的大学制度，就没有一流的大学，这是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后，我们应该意识到的一个根本认识。大学之争，实际上是大学体制上的竞争，这是大学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大学制度的本质内容，是什么样的学术管理制度环境和学术资源配置政策环境，能够促进学术水平的卓越性提高。这其中，以特定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和大学文化观念为主旨，实质是特定的大学制度体现了的、铸就了的大学自主发展的生命力，这包含大学的理想和功能。因此，大学制度的研究倾向于观念层面和组织管理、权力结构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重点和维度也随之变化。

国外的早期研究，以大学理念和精神为主要讨论话题的经典论著为代表。纽曼的《大学的理想》^①成为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他的观点强调大学的理想应当是传授给学生全面知识的观念，这决定了一所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纽曼的大学理想作为传统的大学观念，保留了大学的本源性价值、性质，但是在大学世俗化、专业化的时代背景中，大学必须走向市场化的社会，“走出象牙塔”，在传统、现实和未来理想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

^① [英] 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